

贫困农户信贷可获得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王定祥 周灿 李伶俐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 400715)

摘 要: 本文运用判别抽样法, 定点选取了16个省(市)国定贫困县中的1503户暂时性贫困农户为对象, 对其经济特征、信贷需求及贷款可获得性进行了调查分析, 在此基础上, 运用Probit模型对其贷款可获得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调查发现: 大多数暂时性贫困农户均有信贷需求, 且以中短期和小额为主, 用途以消费为主, 生产次之, 信贷可获得性整体偏低, 且正规信贷获取难度大于非正规信贷。实证结果显示: 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社会关系对贫困农户正规信贷和整体信贷可获得性均有正向影响; 家庭社会关系及区域影响力对非正规信贷可获得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金融机构物理距离对贫困农户信贷可获得性产生了一定的排斥效应。可见, 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社会关系、金融网点已成为我国贫困农户信贷可获得性的现实制约因素。

关键词: 贫困农户; 信贷可获得性; 影响因素; 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53(2017)03-0104-11

一、引言

长期以来, 农村信贷扶贫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决策层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逐步建立了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互助性并存的农村扶贫信贷体系, 为贫困农户提供了

收文日期: 2017-08-11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3AJY019)“财政金融服务创新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机制与模式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JY062)“农村扶贫金融制度构建与创新研究”、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3SKB019)“农村扶贫开发中财政金融协同扶贫机制与模式研究”、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4SKB052)“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研究”和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重大创新团队项目(SWU1509384)“农业现代化中农地资本化的路径优化与制度创新研究”的资助。

作者简介: 王定祥,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获得者, 重庆市优秀人才计划获得者,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研究领域: 金融理论与政策、经济统计。电子邮箱: wdx6188@126.com。周灿,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领域: 金融理论与政策。李伶俐,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 微型金融与公司治理。

大量贷款,而贫困农户获得的信贷大多具有扶贫性质,因而被称为扶贫信贷^①。在财政、金融等多方协同扶贫下,我国农村减贫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由1978年的25000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人,年均下降7.22%(王定祥等,2011)。但由于贫困是相对的,贫困标准不同,贫困人口数量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为了与国际接轨,2011年国务院将我国贫困标准提高到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水平,使得我国贫困人口又恢复性地增长到较高水平。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底,我国尚有贫困村12.8万个,贫困户2949万户,贫困人口总数7017万人,扶贫任务仍然较为艰巨。

虽然制约贫困农户脱贫的因素众多,但资金稀缺、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贫困农户脱贫的关键因素,解决资金问题是缓解其他减贫制约因素的先决条件。所以,在金融减贫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贫困农户能否获取必要的贷款。针对这一问题,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金融排斥理论。Leyshon & Thrift (1993)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发现农户因地理的可达性更容易产生金融地理排斥。Panigyrakis et al (2002)、GuisoL et al (2008)、Cardark & Wilkins (2009)研究了金融需求主体自身经济特征对金融排斥的影响。Eric Osei-Assibey et al (2012)通过对比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发现贫困家庭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而是更倾向于向非正规金融贷款。国内学者也研究了农户普遍存在的金融排斥现象(张杰,2007;许少君等,2009;马九杰等,2010;随艳颖等,2011;董晓林和徐虹,2012),对农户信贷可获得性影响因素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阮红新等,2003;巴曙松等,2009;侯建昀和霍学喜,2016)。但是,上述文献对整体农户群体的信贷可获得性讨论较多,而专门针对贫困农户信贷可获得性的文献讨论得较少。为了探究扶贫信贷运行规律,有必要对贫困农户信贷可获得性进行专门研究。本文旨在探究贫困农户信贷可获得性的真实影响因素,以便为扶贫信贷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假说

从理论上讲,对于存在信贷需求的贫困农户,除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扶贫财政金融政策等因素外,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健康状况、年人均收入水平、固定资产价值、社会资本、与金融机构的物理距离等,都可能是影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对这些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之前,首先提出如下待检理论假说:

假设1: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口健康状况对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具有正向作用。户主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贫困型农户家庭的科学技术获取能力、整体经营能力和市场驾驭能力。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国家扶贫政策的理解能力与投资机会的甄别能力也越强,在向扶贫金融机构信贷交易过程中,价格谈判的能力也就越强,扶贫贷款的可得性就越高。同理,人口健

^①尽管发放给贫困农户的小额信贷也有一些是商业性的,但为了便于研究,在本文中统一为“扶贫信贷”。即扶贫信贷整体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民间互助性四种类型。

康状况越好的家庭,劳动力体力素质就越高,参加劳动获取收入的预期和能力就越强,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也越高,因而扶贫金融机构更愿意贷款,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就越高。

假设2:家庭劳动力数量、年人均收入水平对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具有正向影响。贫困农户家庭拥有的劳动力数量越多,通过农业生产或非农就业获取的农业收入和工资收入就越多,因此具有较高的贷款清偿能力,可以较容易地达到金融机构授信条件。同时,劳动力数量越多的家庭,各项生产和生活开支数量也会相应地增加,当出现生产资金或周转资金缺口,会形成较强的贷款意愿,因此更可能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对于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贫困农户家庭,能够接受的贷款利率上限水平相对更高,发展生产、获取高收入的冒险精神相对较强,具有较高的风险偏好,更加契合金融机构的逐利本性,信贷可获得性也就越强。

假设3:家庭固定资产价值对贫困农户信贷可获得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债务融资中,家庭有效的固定资产可以充当贷款抵押物。贫困农户家庭固定资产价值在扣除家庭负债后的净值越大,借款贫困户冒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越低,金融机构就越有积极性向该类贫困家庭贷款,其扶贫贷款可获得性就越高。反之,很难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到商业性质的扶贫贷款。因此,家庭固定资产价值与扶贫信贷可获得性之间必然存在正向关系。

假设4:社会资本的丰裕程度与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具有正向关系。社会资本是指贫困农户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包括亲戚、朋友、熟人关系圈。对于社会资本与农户贷款可获得性之间的关系,张建杰(2008)认为,建立在亲缘和业缘基础上的社会资本对正规和非正规金融信贷可获得性都发挥了“特质性”作用。同样地,如果贫困农户家庭拥有关系亲密的村干部或亲戚朋友在金融机构工作等社会资源,就可能通过社会资本削弱贫困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贫困农户扶贫贷款的可获得性就越大。

假设5:与金融机构的物理距离对贫困农户家庭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具有负向影响。贫困农户家庭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物理距离越远,不仅会增加贫困农户借款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信息搜寻成本,还会使贫困农户容易产生“弃贷”的念头,最终主动放弃向金融机构贷款。同时,从借贷双方信息沟通以及扶贫贷款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来看,也增加了较多的风险隐患和交易成本。因此,贫困农户家庭住址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物理距离越远,借贷双方融资意愿就越弱,这必然会降低贫困型农户的信贷可获得性。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为了使样本数据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全国贫困地区融资现状和贫困农户金融需求行为特征,2015年我们对重庆等16个省(市)的部分国定贫困县的贫困农户进行了判别抽样问卷调查。具体的调查方法为:首先,以中西部为重点,兼顾东部,选取了16个省(市),并在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确定调查样本县;然后,在各省区市贫困县选取典型的贫困乡,并以其贫困村作为调查点;最后,在当地村干部带领下逐一对该贫困村年人均纯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贫困农户进行了调查。

本次调查各省市最终收集到的样本数分别为：重庆348户、贵州147户、四川207户、陕西54户、云南81户、湖南83户、湖北33户、河南92户、河北114户、山西59户、江西108户、安徽98户、新疆30户、辽宁51户、山东116户、福建29户，共计1650户。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有信贷需求的暂时性贫困农户^①，所以剔除了永久性贫困农户样本数，最终得到有效样本数为1503户，有效样本率为91.09%。

（二）贫困农户的经济特征

通过对1503户有效样本贫困农户的调查发现，贫困农户主要具有以下经济特征：

1. 户主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被调查的1503户贫困农户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户主人数所占比例较大，而高中及以上的户主人数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其中，初中和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户主占样本总数的累计比例达到91.02%；高中占8.89%；大专及以上的户主数为零。

2. 在贫困农户中，相对贫困比较突出。在1503户提交借贷申请的贫困农户中，位于相对贫困线2300元以下的占71.86%；而绝对贫困人口占28.14%。

3. 农业生产是贫困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其次是外出务工收入。在1503户提交借贷申请的贫困农户中，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贫困农户占47.90%，外出务工收入所占比例为42.51%；而政府救助和其它收入来源所占比重较少，分别占1.20%和8.39%。这一方面揭示了我国贫困农户收入来源渠道单一和农业投资回报率低的事实，同时也说明贫困农户的劳动能力并未丧失。

4. 贫困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中，种植业所占比重较大。调查发现，从事种植业的农户占有效样本农户总数的71.26%。说明贫困农户的农业生产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生产方式单一，投资回收期较长，农产品附加值低，制约了贫困农户的收入增长。

5. 家庭固定资产价值普遍偏低。在1503户样本农户中，家庭固定资产价值在3万元及其以下的贫困农户占71.65%；3万~5万元与5万元以上贫困农户合计所占比例为20%左右。这表明我国贫困农户在信贷活动中，资产抵押担保约束十分严重，难以满足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

（三）贫困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

贫困型农户收入来源渠道单一，年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加之农业生产属于弱质产业，收入的稳定性和保障性极其有限，导致家庭储蓄普遍较低，对信贷有需求的农户较高。在1503户样本贫困农户中，有借贷需求的农户占87.78%，而真正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有816户，占54.29%，说明我国贫困型农户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而发生借贷行为的贫困农户，其信贷需求及信贷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信贷需求以小额、中短期为主。2000元以下、2000~5000元、5000元~1万元、1万元以上的融资比例依次为6.67%、17.78%、46.67%和28.89%。说明贫困农户的信贷需求额度一般较小。从融资期限来看，在6个月~1年、1~3年的农户比例分别为46.67%和40%，合计达到86.67%；6个月以内和3年以上的农户所占比例都较低，分别为4.44%、8.89%。由于盖房、子女上学、大病支出等

^①所谓暂时性贫困农户，是指劳动能力并没有丧失，因疾病、灾害等原因而导致的短暂性贫困，经过后期劳动形成收入可以逐渐摆脱贫困的农户。所谓永久性贫困型农户，是指那些长期丧失劳动能力而陷入贫困的农户家庭。

消费性支出用款时间较长,使得贫困型农户对信贷期限选择更加倾向中短期。

2.信贷行为以民间借贷为主。调查数据显示,在有信贷需求的贫困农户中,有59.11%的农户会选择向亲戚朋友借款,28.89%的贫困农户选择民间高利贷借款,而仅有12%的贫困农户会选择金融机构借款。这一结果不仅反映了贫困农户在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率较低。

3.信贷用途以消费性支出为主,生产性支出为辅。在816户获得贷款的贫困农户中,用于消费性支出的农户数达459户,所占比例为56.25%;而用于生产性支出的农户数为252户,所占比例仅为30.88%;用于其它用途的比例为12.87%。这表明目前贫困型农户的信贷资金以满足消费需求为主。

(四) 贫困农户贷款可获得性特征

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地区,强烈的信贷约束是阻碍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这种强烈的信贷约束,一方面可能来自政府的金融管制和金融机构信贷配给,另一方面内生性地来自于贫困农户自身的信用条件,包括与贫困农户信贷交易成本高、抵押担保条件缺失、信息不对称等,而被金融机构排除在信贷门槛之外。

在有信贷需求的1503户样本贫困农户中,获得过贷款的农户数为816户,占样本农户总数的54.29%,未获得贷款的农户数有687户,占比为45.71%。说明我国贫困农户的金融排斥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贫困农户信贷可获得性整体偏低,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成为农户无法摆脱贫困陷阱的主因。同时,从贷款来源渠道看,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农户数达352户,占有获得贷款农户的比重为43.14%,从非正规金融获得贷款的农户数为497户,占比达到60.91%^①。说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正规金融形成了“互补效应”,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对提高贫困农户贷款可获得性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从贫困农户与金融机构的物理距离和贫困农户社会关系来看,认为与金融机构物理距离很近和较近的农户占比为25.75%,有74.25%的贫困农户认为家庭与金融机构的距离较远;同时,仅有30.28%的贫困农户在金融机构或政府部门有熟人,而69.72%的贫困农户不存在类似的社会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农户对贷款的可获取性。

四、贫困农户信贷可获得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 计量模型选取及说明

实证研究中,由于被解释变量“扶贫信贷可获得性”是一个二元选择问题,同时,解释变量向量主要涉及贫困农户家庭的一些资源禀赋属性等。若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设定为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这不仅会受到随机误差项异方差性的影响,最终使得参数估计失去有效性,而且即使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来修正随机误差项的异方差问题,也无法保证模型的预测值在(0,1)之

^①在获得贷款的816户贫困农户中,部分贫困农户贷款资金既来自正规金融,又来自非正规金融。因此,导致从正规金融获得贷款的农户数+非正规金融获得贷款农户数之和大于获得贷款的贫困农户总数。

间。因此，为了克服线性回归的局限性，本文选择二项分布的Probit模型对贫困型农户扶贫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模型的基本表达形式如下：

$$Y_{li} = C_{li} + \beta_{lij} X_{lij} + \mu_{li} \tag{1}$$

在式（1）中， Y_{ij} 为虚拟被解释变量，即二元选择变量，取值为1或0，代表贫困农户对扶贫信贷的可获得性； Y_{i1} =1代表贫困农户对所有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的可获得性， Y_{i1} =0代表贫困农户对所有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的不可获得性； Y_{i2} =1代表贫困农户对正规金融扶贫信贷的可获得性， Y_{i2} =0代表贫困农户对正规金融扶贫信贷的不可获得性； Y_{i3} =1代表贫困农户对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的可获得性， Y_{i3} =0代表贫困农户对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的不可获得性； C_{li} 代表常数项， β_{lij} 代表解释变量的系数向量， X_{lij} 代表解释变量向量， μ_{li} 代表随机误差项。其中 $i=1, 2, 3; j=1, 2, 3 \dots n$ 。

表4 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实证模型指标体系说明

被解释变量	变量定义
Y_{i1}	贫困农户对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 获得=1; 没有获得=0
Y_{i2}	贫困农户对正规金融的扶贫信贷可获得性: 获得=1; 没有获得=0
Y_{i3}	贫困农户对非正规金融的扶贫信贷可获得性: 获得=1; 没有获得=0
解释变量	
$X_{i11}/X_{i21}/X_{i31}$	贫困农户户主教育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3; 大专及其以上=4
$X_{i12}/X_{i22}/X_{i32}$	贫困农户家庭的劳动力人数
$X_{i13}/X_{i23}/X_{i33}$	贫困农户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 良好=1; 一般=2; 较差=3; 很差=4
$X_{i14}/X_{i24}/X_{i34}$	贫困农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绝对贫困线1500元以下=1; 相对贫困线2300元以下=2
$X_{i15}/X_{i25}/X_{i35}$	家庭固定资产的价值: 1万元以下=1; 1万~3万元=2; 3万~5万元=3; 5万元以上=4
$X_{i16}/X_{i26}/X_{i36}$	贫困农户是否有亲戚朋友在政府或金融机构工作: 有=1; 无=2
$X_{i17}/X_{i27}/X_{i37}$	贫困农户与最近金融机构的物理距离: 很近=1; 较近=2; 一般=3; 较远=4
X_{i38}	贫困农户家族在所在地区的社会影响力

（二）指标体系设计

由于贫困农户获得商业性质的小额扶贫信贷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里基于前文的理论假设因素，进一步对贫困型农户获取商业性小额扶贫信贷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模型包括8个解释变量和3个被解释变量，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4所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8.0软件，分别对贫困农户家庭的扶贫信贷整体可获得性（ Y_{i1} ）、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 Y_{i2} ）以及非正规金融的扶贫信贷可得性（ Y_{i3} ）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报告如表5所示。

表5 贫困农户信贷可获得性影响因素Probit模型检验结果

因变量	Y11	因变量	Y12	因变量	Y13
估计方法: ML-Binary Probit					
样本数	1503	样本数	816	样本数	816
Y11=0	687	Y12=0	464	Y13=0	319
Y11=1	816	Y12=1	352	Y13=1	497
自变量		自变量		自变量	
C1	1.651355*** [3.33228,0.0008]	C2	-2.411812*** [-2.57536,0.0100]	C3	-0.361549 [-0.41308, 0.6723]
X11	0.204045** [1.98367,0.0472]	X121	1.649478***[6.10087,0.0001]	X131	-0.545965*** [-3.38549,0.0008]
X12	0.076218 [1.16405,0.2445]	X122	-0.35763** [-2.20413,0.0276]	X132	0.134243 [1.02608,0.3083]
X13	-0.403857*** [-5.04347,0.0000]	X123	-0.066412 [-0.39428,0.6924]	X133	-0.138860 [-0.93257,0.3511]
X14	0.126516* [1.77954,0.0752]	X124	0.037082 [0.25865,0.7961]	X134	0.227836* [1.83542,0.0663]
X15	0.041311 [0.58487,0.5576]	X125	0.058346 [0.41546,0.6788]	X135	0.202347 [1.64119,0.1009]
X16	1.052356*** [6.85483,0.0001]	X126	0.40593 [1.31802,0.1876]	X136	0.523581** [2.02828,0.0426]
X17	-0.191788** [-2.29214,0.0220]	X127	-0.319775* [-1.735651,0.0836]	X137	-0.232997 [-1.50662,0.1329]
				X138	0.581623*** [3.28213,0.0011]
Log likelihood	195.5153		52.6176		71.5068
P(LR statistic)	0.0000		0.0000		0.0000

注:表中“***、**、*”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水平,[]中前面的数值代表z统计量,后面的数值代表接受或拒绝原假设的p值。

从表5显示的贫困农户扶贫信贷整体可获得性、正规金融的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和非正规金融的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可知:

1.贫困农户户主的教育文化水平($X_{11}/X_{121}/X_{131}$)对其扶贫信贷的整体可得性(Y_{11})、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得性(Y_{12})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与理论假设1相吻合。而对贫困农户从非正规金融获取扶贫信贷(Y_{13})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与理论假设1相背离。也就是说,贫困农户户主的教育文化水平越高,其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扶贫贷款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向非正规金融组织获取扶贫贷款的可能性反而越小。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是户主的教育文化水平越高,对国家扶贫金融政策的了解和认识的程度越深刻,对于非正规金融安全性的认识也更深入,加之正规金融的贷款利率往往低于非正规贷款,因而一旦产生贷款需求,就自然会理性选择正规金融贷款。二是户主教育文化水平越高,其金融交易谈判的能力就较强,且可能更擅长于生产性投资和经营管理,使得还贷更有保障,因而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2.家庭劳动力数量($X_{112}/X_{122}/X_{132}$)对扶贫信贷整体可获得性(Y_{11})和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Y_{13})有正向影响,但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对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Y_{12})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与理论假设2相悖离。这可能与当前我国贫困农户劳动力的素质、家庭负担、就业稳定性等存在密切的关联。贫困农户家庭劳动力素质水平比较低,家庭负担比较重,创收能力较弱导致家庭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即使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但消费支出也较多,在短期内贫困农户家庭按期还款的能力较弱,因而使得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商业性扶贫信贷的可能性较小。

3.家庭成员健康情况($X_{113}/X_{123}/X_{133}$)对扶贫信贷整体可获得性(Y_{11})具有负向影响,且统计意义显著。这表明贫困农户家庭成员健康水平越高,其整体获得商业性扶贫信贷的可能性反而在下降,与理论假设1完全悖离。可能的原因在于,受传统“无负债光荣”的“惜借”思想的影响,人口健康状况愈好的贫困农户家庭,越希望通过辛勤劳动获取收入,以弥补其资金缺口。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对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Y_{12})和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Y_{13})同样具有负面影响关系,但在10%的显著水平下未通过检验,这可能与样本容量小有关。

4.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水平($X_{114}/X_{124}/X_{134}$)对扶贫信贷整体可获得性(Y_{11})、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Y_{12})、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Y_{13})均具有正向影响关系,除了对正规扶贫信贷可获得性不显著外,对整体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和非正规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这表明年人均纯收入水平越高的贫困农户家庭,其获得商业性扶贫信贷的可能性就越高。因为贫困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越高,其抵押担保能力和清偿债务的能力相对较强,金融参与意愿和积极性也相对较高(刘晓欣,2012),因而商业性扶贫信贷的可获得性就会相应提高。就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言,主要是因为正规金融商业性扶贫信贷需要的信息条件较高,贷款过程较漫长,相比之下,贫困农户更愿意向便捷的非正规金融贷款。

5.家庭固定资产价值($X_{115}/X_{125}/X_{135}$)对贫困农户扶贫信贷整体可获得性(Y_{11})、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Y_{12})以及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Y_{13})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都没有在统计意义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其正向促进作用的结果与理论假设3相吻合,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与样本贫困农户家庭的固定资产价值普遍偏低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家庭固定资产价值在3万元及以下的贫困农户合计占比约为76.65%,说明绝大多数贫困农户家庭的固定资产价值小、抵押能力不足,基本无法满足金融机构所需要的抵押物条件。

6. 社会关系^①($X_{116}/X_{126}/X_{136}$)对扶贫信贷整体可获得性(Y_{11})、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Y_{13})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Y_{12})虽然也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证明贫困农户家庭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越多,从金融机构获取商业性扶贫信贷的可能性越高。而正规金融机构受到较强的金融监管约束,凭借社会关系提供贷款的行政处罚风险相对

较高,这可能是造成社会关系对正规扶贫信贷可获得性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的重要原因。家族的地区影响力(X_{138})对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地区影响力越强的贫困农户家庭,从非正规金融获取商业性扶贫信贷的可能性就越大。主要原因是贫困农户的社会影响力越大,其经济金融活动的带动效应、示范效应、社会压力效应就比较突出,履行金融诚信交易的自觉性就越高,金融机构更乐意为这些有社会影响的贫困农户放款。

7.与金融机构的物理距离($X_{117}/X_{127}/X_{137}$)对贫困农户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具有负向作用。这就是说,贫困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物理距离越远,双方达成信用交易的意愿就会越弱,贫困农户获得扶贫贷款的可能性必然会降低,这与理论假设5高度吻合。因为借贷双方的物理距离越远,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及其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就可能越严重,不仅金融机构获取贫困农户家庭的信息成本、资金监督成本和贷款风险会提高,而且贫困农户发生借贷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谈判成本等交易成本也会显著提高,从而使得贫困农户获得商业性扶贫信贷的可能性就会越小。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流动办公、流动服务缩小与贫困农户家庭的物理距离,减少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可能是造成与金融机构的物理距离对非正规扶贫信贷可获得性负向影响不显著的重要原因。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判别抽样法,随机选取了16个省市的贫困县1503户贫困农户作为调查对象,在对其经济特征、融资特征及贷款可获得性特征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Probit模型,对其贷款可获得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调查统计发现:我国暂时性贫困农户的户主受教育文化程度、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家庭固定资产价值普遍较低,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贫困农户信贷需求较为普遍,以中短期和小额信贷需求为主,贷款主要用于消费性支出,生产性用途次之;在扶贫信贷可获得性整体偏低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凭借自身信息优势与正规金融扶贫贷款存在明显的“互补效应”。计量结果显示:我国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对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和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户主受教育文化程度、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社会关系对整体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及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贫困农户家庭固定资产价值普遍偏低,抵押担保功能薄弱,对贫困农户获得商业性扶贫贷款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贫困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健康状况对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反而存在抑制作用,人力资本状况越好的家庭,“惜借”现象可能越突出。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可获得性对贫困农户家庭社会关系资本、家族影响力有更高的依赖性,非正规金融扶贫信贷更倾向于“关系借贷”。而与金融机构的物理距离,对贫困农户获取正规金融扶贫信贷

①从实际情况来看,社会关系是一个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难以用某一具体指标来准确衡量,为便于研究,本文借鉴学界目前惯用的指标“借款者是否有熟人在政府或金融机构等部门工作”予以代替。

带来了明显的排斥作用,降低了贫困农户的正规扶贫信贷可获得性。

基于以上结论,为了提高贫困农户贷款可获得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构筑多元化农村扶贫信贷组织体系,提高扶贫信贷市场竞争程度。应根据贫困农户经济特征和小额、短期和多样化的信贷需求特点,构建一个包括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合作金融、互助金融、农业保险和信贷担保在内的多元化扶贫金融服务体系。第二,加快扶贫信贷产品与服务创新,满足贫困农户的融资需求。根据贫困农户贫困原因提供差异化的贷款品种,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生产等扶贫开发贷款,期限根据需要设定。第三,健全农村扶贫信贷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增强信贷机构参与农村扶贫的信心。如建立农村资产评估和流转体系,扩大贫困农户抵押担保品范围,推广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权等担保抵押;鼓励商业性担保机构、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和组织等开展贫困农户担保业务,积极推广贫困农户互保联保贷款模式,大力发展扶贫信贷保险业务,促进扶贫信贷风险分摊社会化。第四,完善农村扶贫信贷法律体系,确保贫困农户公平享受金融发展成果。应制定包括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内的《小额信贷法》等法规,依法对一些不正当竞争的借贷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使扶贫贷款能公平、公正到达贫困农户手中。第五,加强政府在金融扶贫中的引导作用。政府可通过财政贴息、奖励、税收减免等激励机制,降低扶贫信贷机构的成本和风险,有效缓和金融机构盈利性与贫困农户较低利率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第六,优化扶贫金融生态环境。加大财政对扶贫项目的开发力度,对贫困户高中生实行免费教育,加强交通、通讯、金融网点布局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落后面貌,促进其从自然经济走向分工经济、市场经济,以增强扶贫信贷机构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 [1]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调整的绩效:金融需求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1985.
- [3]巴曙松,栾雪剑.农村小额信贷可获得性问题分析与对策[J].经济学家,2009(4):37-43.
- [4]王定祥,田庆刚,李伶俐,王小华.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与信贷行为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0(5): 124-138.
- [5]董晓林,徐虹.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实证研究—基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的视角[J].金融研究, 2012 (9):115-126.
- [6]马九杰,沈杰.中国农村金融排斥态势与金融普惠策略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0(5).
- [7]阮红新,杨海军,雷春柱.信贷资产分散条件下的风险与收益: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3(9): 95-102.
- [8]隋艳颖,马晓河.西部农牧户受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内蒙古自治区7个旗(县)338户农牧户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 2011(3): 50-60.
- [9]侯建昀,霍学喜.信贷可得性、融资规模与农户农地流转——以专业化生产农户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6,(06):29-39.

- [10] 许少君, 金雪军. 农户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 (6)
- [11] Cardark B, Wilkins R.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Risky Asset Holding: Australian Evidence on Background Risk and Other Factors[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9(33):850–860.
- [12] Eric Osei-Assibey, Godfred A. Bokpin, Daniel K. Twerefou. Microenterprise financing preference: Testing POH within the context of Ghana's rural financial market [J].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Iss1), 2012 (39), 84–105.
- [13] Gusi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Trusting the Stock Market[J]. Journal of Finance, 2008(63):2557–2600.
- [14] Leyshon, A. & N. Thrift.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UK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n the 1990s: a reversal of fortune?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3(9): 223–241.
- [15] Panigyrakis, G.G., Theodoridis, P.K., Veloutsou, C.A. All Customers are not Treated Equally: Financial Exclusion in Isolated Greek Islands[J].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Marketing, 2002(7):54–66.

Empirical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edit Availability to Poor Farmers

Wang Dingxiang Zhou Can Li Lingl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chooses 1503 temporary poor farmers from 16 poor provinces in China by using discriminant sampling method and makes a survey analysis of their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credit demanding and availability of credit. On this basis, we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edit availability by using Probit models. The survey findings show that most of the temporary poor farmers have credit demanding, which is oriented to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but the credit availability is low, and accessing to formal finance is more difficult than to non-forma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householders' education level, family income, social relations all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ccessibility to credit. Household assets, population scale and health situation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vailability of credit but is not significant; The families'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its regional influen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credit availability to informal finance; to some extent, the physical distance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uts a repulsion effect on the credit availability. Visibly, the low education level of householders, less family income, poor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far physical distance are th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to poor credit availability for poor farmers.

Key words: Poor farmers; Availability of credit;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Probit

(责任编辑: 张赶)